#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

芦笛

一、 弥天大谎竟成"正史"

我党统治的最突出特点，是所有"正史"全不可信，基本上是弥天大谎，这一点似乎可以在正派人中获得共识，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乃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之事。

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伪造历史并不自我党始，乃是国民党首先开始的政治实践。在国民党武力夺权成功，成了中央政府后，当即将从苏联学来的那套引入中国，破除了民初的教育与新闻的独立性，以政府权力干预历史教科书写作，开始了伪造历史的系统工程，使得国府治下的清末民初历史教育基本成了毫无可信度的拙劣政治宣传。这拙劣宣传由我党沿袭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完美实现了郭沫若同志提出的"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理想境界，以致窃国大盗孙中山成了民主革命领袖，而先总统袁公反倒成了窃国大盗。

说来滑稽，先总统袁公在国民党"奸史教育"宣传中蒙受的遭遇，恰似先总统蒋公在我党手下蒙受的遭遇，什么污水都给泼上去了。所以，说起来，老蒋被我党妖魔化，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正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作法自毙，咎由自取。

最近天天读史，每日起码十四五小时而孜孜不倦，兴致盎然，这与我当初冒充科学家时看专业文献可完全是两回事，不由想到，如果我当初干对了专业，那早就脱颖而出了。越读便越觉得中国文科学者智力之低，远远超出了我当初最坏的估计。

就拿袁公世凯蒙受的诬蔑来说吧，如果不读史，你就不会发现那些指控简直荒唐到构成了对人类智力的放肆嘲弄。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就是有本事对此类弱智谎言信之不疑，哪怕在有人提出严重质疑后，还要顽固拒绝对那些"史实"加以再考虑。

先总统袁公蒙受的攻击数不胜数，几乎每项都是无稽之谈，随便举几项吧：

1、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从朝鲜逃跑。

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战场指挥官而是外交官员，是奉政府之命，按国际公法下旗撤馆回来的。

2、 出卖谭嗣同等维新党人，致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粉碎了戊戌变法。

这是本文要谈的话题。

3、 暗杀大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暗杀了策划起义的第六镇统制吴禄祯，以及满清宗社党领袖良弼，在民国成立后暗杀了"开国元勋"张振武，国民党实际领袖宋教仁。

这问题我已经在《是谁杀了宋教仁》中专门论述过，指出张振武乃是黎元洪密电让袁以军令明杀的，不是什么暗杀，而暗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犯乃是孙文和陈其美。但就连我都被蒙蔽

了，在文中认定吴禄祯确实是袁下令暗杀的。最近读史才发现那指控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完全是文革式冤狱。

“良弼被袁世凯暗杀说”见于各种历史通俗读物，为马悲鸣坚持至今。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北京同盟会暗杀部的杰作，杀手是彭家珍。孙中山曾在临时政府成立后以临时大总统身份追封彭为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并誉其暗杀行动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主席毛泽东还给其家属颁发“永垂不朽”的烈士光荣证。

4、 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后，孙文力主定都南京，要袁世凯南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派蔡元培等人作为“迎袁专使”，进京敦促袁世凯南下。袁在接见专使时满口答应，却在 1912 年 2 月 29 日唆使北洋第三镇士兵发动兵变，抢劫北京人民。袁因此籍口北方局势不稳，无法离开北京而在北京宣誓就职，挫败了革命党人的计划。

此说也为热衷于宣讲劣等通俗读物的马悲鸣和林思云奉为金箴。其实连对孙极度同情、对袁极度痛恨的台湾学者丁中江都无法同意，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指出兵变很容易失控，袁绝对不敢玩这类火，而且袁急于当总统，最怕的就是列强干涉，而兵变恰好为列强干涉提供了最佳借口（当然这是我的再表述，并非作者原话）。

的确，兵变发生后，列强以为又是一次拳乱，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议决各国紧急调兵入北京，组成国际兵团在北京巡逻，维护治安，保护侨民。 吓得老袁接连致函各国公使，又是道歉，又是劝阻洋兵来京，又是保证维护治安并答应对洋商损失作赔偿，又是保证新政府一定承认信守过去缔结的一切国际条约。稍知袁宫保处理拳乱的英明态度的读者都能立刻看出，他最怕的就是暴民乱兵引来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岂会为了区区南下问题去烧香引鬼？

5、 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这也是弥天大谎，鉴于当时中国毫无抵抗能力，老袁确实被迫接受了该条约的部分条款，但在这之前他已经使尽一切解数了，而且在签约后还不遗余力地颠覆条约规定。换任何人去都未必能做到他那地步。

1915 年 1 月，日本大隈内阁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袁世凯在陆军总长汇报与日开战必输无疑之后，想尽办法挫败日本的野心。他一面故意将日本的要求泄露出去(恰与今日中共秘密签约卖国形成鲜明对照)，以便国内外舆论抨击日本，引起列强干涉，并坚定表示：“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一面对日方要求逐条作了批示，或严词驳回：“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指示外长：“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或采取拖延战术：“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或稍作让步敷衍之：“（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探情报，贿赂议员，发起弹劾大隈内阁。

在袁公的努力下，最后签订的文本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

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多被袁破坏。袁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虽是流氓手段，但积弱之至的中国既不可能凭实力硬抗，又无望于列强主持公道，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这些流氓手段还真奏效了，不但购地租地成了一纸空文，其他条款也悉数落空。日本人自己就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日本“顾问”们也承认：“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就连继任首相寺内正毅也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即使如此，袁公仍引此事为奇耻大辱。签订条约后，他给全国官吏下了秘密文告，要全国军民牢记这一国耻，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在未来洗雪这一国耻。他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败，令人写了一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以上据《五四运动述实》）

然而就是此类弱智谎言成了咱们历史课的授课内容，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有的学者靠自己的调查戳破了某些谎言后，还有学者抱残守缺，誓死捍卫那弱智谎言，国内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的争论就最有代表性。

关于戊戌政变的真相，过去教科书一直原封不动地转述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中撒的弥天大谎。梁的说法是：

事变前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召见六君子中的杨锐，密赐衣带诏，有“联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谭嗣同和康有为捧着衣带诏痛哭。谭于是就向光绪密奏，说袁世凯是力主变法的将领，请皇帝施恩罗致之。皇帝于是于八月初一召见袁，特封侍郎（相当于如今的副部长），初二又召见了他。

到初三晚上，谭嗣同就去秘密见袁，先问他对皇帝的评价，袁称为“旷代之圣主。”后又问：“你知道天津阅兵的阴谋么？”袁答：“听说了一些。”谭便出示了衣带诏，说：“今日只有足下能救我圣主了！如你愿意救就去救，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去检举我，杀了我你就可以享富贵了。”袁乃正色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和足下一样都受了皇上厚恩，不光是足下有救护的责任。你有什么见教就说出来吧。”

谭说：“荣禄的密谋全在于天津阅兵，荣禄属下有董福祥、聂士成和足下三只队伍，但董聂成不了大事，天下健者唯有足下。如果变乱起来了，你以一军敌聂董两军，保护圣主，恢复皇权，清君侧，就此成不世大业。”袁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冲入我的营房，传下号令诛杀奸贼，则我一定跟随诸君子之后，效死补救大局。”

谭问：“荣禄对你从来很好，你准备怎么对付他？”袁笑而不答，某幕僚道：“荣贼并非真心对待大帅。胡景桂乃是荣的死党，前年奉荣命参劾大帅，荣故意查明真相，查办了胡并为大帅昭雪，籍此笼络大帅，但他立刻就将胡任为宁夏知府，接着又升了宁夏道台，这就是荣贼的阴险狡猾，大帅岂有不知的？”谭说：“荣禄乃王莽曹操一类人物，绝世枭雄，恐怕不易

对付。”袁怒目而视，说：“只要皇上在我的兵营里，杀荣禄如杀一条狗一般！”

谭于是和袁商量具体的救主步骤。袁说：“现在兵营里的弹药都在荣贼手中，而且营官哨官（营连长）多是他的旧人。现在事情已经很紧急了，计划既已确定，那我得立即回去，更换将官，设法储备弹药才行。”谭叮嘱了一番才告辞回去。初五，袁再度被皇帝召见，到初六，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政变。

这段神话我从青年时代便看得烂熟了，却从来没去想想它编造得有何等弱智，重大关节处非但语焉不详，而且荒唐到可笑的地步。据说，反动派荣禄策划了一个叛逆阴谋，那就是所谓“天津阅兵”，他准备在光绪与慈禧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了甚至杀害光绪，归政于慈禧。光绪为此效法汉献帝，给杨锐下了个衣带诏，于是便引出了上面那段故事。袁世凯慷慨壮烈地答应了老谭，转身过去便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震怒，当即从颐和园回宫，宣布皇帝身体违和，恢复“训政”，再度执掌朝柄，并处死了“六君子”。

这里立刻就出来个问题：荣禄计划在两宫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杀了皇帝，到底是否获得了慈禧同意？如果没有，那就是谋逆大罪，康和谭只需去首告就是了，何必捧诏痛哭？如果慈禧同意了，那该怎么处理慈禧？莫非袁世凯的任务就是到时请光绪跑进他的兵营来，再奉诏讨贼诛杀荣禄，却不碰祸首慈禧一根毫毛？天下能有这种事么？老袁再是白痴，也该问明“拿慈禧怎么办，是保护还是杀了”这一关键问题吧？而这段“史实”记录里居然就无片言只语提到此事！

更可笑的是，慈禧权倾朝野，光绪不过是个傀儡，她老人家要废掉光绪，话一句耳，有何必要使用如此激烈、极端、后患无穷的暴力手段？毕竟，命令或默许直隶总督荣禄发动兵变，劫持甚至杀害皇上，彻底违反了传统社会的“纲纪”，更何况那皇帝还是她名义上的儿子！慈禧就再是白痴，也不至于蠢到看不出此举乃是唆使臣下犯上作乱，会彻底破坏她的“圣太后”的光辉形象吧？这一套若在日后成了风气，朝廷还怎么治国？

所以，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者都能看出梁启超这段“史实记录”起码是不尽不实，在逻辑和常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最近重读这历史文献，我简直不能相信史学家们能弱智到郑重转述这些屁话，而我自己当初也会堕落到毫不思索地接受它，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

## 二、 袁世凯的说法

那密谋涉及到的另一方袁大头又是怎么说的呢？事变后，老袁写了份《戊戌日记》，其略云：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袁奉召自天津抵京，在法华寺租房子住。八月初一黎明，皇帝在毓兰堂召见他，详细询问军事，他据实回奏了，接着说，九月份皇上要到天津巡幸，直隶总督荣禄令我督率修理操场，并提前商议要操演的阵法，我必须赶回天津去料理。所以若皇上没有其他事要垂询我的，那就请训吧（注：所谓“请训”是疆臣返回职守前皇帝面授机宜的规定过场）。皇上说四天后再来请训，不要太耽搁了。袁退下后回寓所吃了点东西就睡下了（四鼓就进宫门等候召见，当然要回来补睡，过去的皇帝和大臣也真苦）。

这时忽有苏拉来报，说袁被封为候补侍郎（候补副部长），奉旨令他初五去“请训”。袁自知无功受禄，汗流浃背，决意上疏辞去，为友人劝止。午后他拜谒礼亲王未遇，又拜谒了刚相国，王、裕两位尚书在座。袁说明自己无功受赏，于心不安，要辞去。王尚书告诉他这是特恩，非但辞不了，还会露出皇上宠信的痕迹来，所以不可辞。次早袁去谢恩，对皇帝反复说明自己毫无寸功，受此破格之赏，惭愧万状，皇上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初三那天，他接到天津兵营来电，说发现多只英舰在大沽海口游弋，荣禄令各营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受调，接着又接到荣禄令专人送来的命令，说英舰游弋，已调聂士成的十营军队驻扎陈家沟待变，命他立即回防。袁因已定初五“请训”，不能擅自离开，因此让幕僚写奏折说明情况，准备提前一日进宫请训，完后立即回天津。正在内室点烛拟稿时，突闻外室有人声，门房持名片来报，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待传请，已经自己下车进了客厅。他赶快看名片，来者乃是谭嗣同。

他知道谭是圣眷正隆的新贵近臣，突然夜访，必有大事，于是便停笔出迎。谭先是祝贺他升官，接着便说有话要说，要到内室去讲，请他屏退左右。他心里很觉惊讶，但还是把谭请入内室，说了些客套话。谭说他会看相，看出袁有“大将格局”，接着突然说，“公是否初五请训？”袁告诉谭现发现英国军舰在海上游弋，所以准备明日就请训，完后立即回津。

谭说：“外侮不足忧，内患才是大可忧者。”袁惊问其详，谭问：“荣禄某日向太后献策，要废了杀了皇上（“废立弑君”），你知道此事么？”袁说他在天津经常和荣禄晤谈，从谈话中可以看出荣是忠臣，绝无此意，一定是谣言。

谭说：“你光明磊落，不知道此人极度狡诈。他表面对你很好，其实非常猜忌你。你辛苦多年，中外钦佩，但去年只升了一级，就是荣禄在压制你的结果。康有为先生曾在皇上面前保奏你，但皇上却说：’听太后和荣禄常说袁世凯跋扈不可用。’这可是真的，知道的人很多。我也曾在皇上面前多次力保，但都被荣某压下来了。皇上常说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破格提拔你，我们都花了很大力气。如你真心想救皇上，我有个方法和你商量。”

接着谭就拿出份草稿来，外表如同名片一般（说明，满清的名片尺寸颇大，不是今天流行的西式名片），里面写的是：

“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时，应请皇上下一道朱谕（注：所谓朱谕就是皇帝用朱砂写的亲笔圣旨，比一般由翰林院代写再加盖玉玺的圣旨效力更高），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到荣某后便请出朱谕宣读，将其立即正法。然后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封禁电报局和铁路，迅速载袁部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卫皇宫，如此则人事可定。袁并应对皇上说，如皇上不听臣策，那臣今日就死在皇上面前！”

袁听了吓得魂飞天外，因问道：“围颐和园干什么？”谭答：“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由我料理，你不必管了。”

袁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常用忠义训戒部下，如令竟然带头作乱，必不可行。"

谭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还打电报到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除此老朽是我的事，用不着你。但要你做到两件事：诛荣禄和兵围颐和园。如你不答应，那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你的性命在我手，我的性命也在你手，今晚必须定议，我这就进宫去请旨办理。"

袁说："此事关系太大，绝非能草率决定，你就是今晚杀了我也绝对无法决定。而且你今夜去请旨，皇上也未必会批准。"

谭答："我有挟制皇上的办法，皇上一定会批准的。初五那天皇上一定会面交给你一道朱谕。"

袁见谭气焰凶狠，类似疯狂，但他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突然把直隶总督杀了（注：直隶总督衙门在天津），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而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我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只怕在外一动兵，北京立即设防，反倒先危及皇上。"

谭说："你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突然袭击，起兵时，将朱谕分发诸军，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答："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说："你可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你存收，等布置妥当后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说："我本人万不敢惜死，但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那我这臣子就死有余辜。一旦落下白纸黑字就有泄密危险，所以你切不可让皇上先把朱谕交给我。你先回去，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天，才能告诉你怎么办。"

谭说："皇上的意思很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立刻定准一个办法，才能复命。"

接着谭就把朱谕拿了出来，乃是用墨笔而非朱砂写的，字很工整，也像是皇上的口气，大致意思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袁看那大概语意，似乎是四人请急变法，皇上婉言拒绝，于是问道："这并不是朱谕，而且没有诛荣禄与围颐和园之说啊？"

谭答："朱谕存在林旭手上，这是杨锐抄给我看的，确实有此朱谕，是三日前发下来的。林旭等人太可恶了，不立即交我，几乎误了大事。谕内说的'另议良法'，就有杀荣禄与围颐和园两件在内。"

袁至此更知那乃是谭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道："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

谭再三催促，要袁立即同意，他要赶回宫去上奏，几至声色俱厉。袁见他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知道谭决不肯空手回去，便说："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到那时各军都聚集在一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说："等不到九月皇帝就要给废了杀了，形势万分危急!"

袁说："既然已有皇上巡幸之命，必不至突然发生意外事件，必须等到下月才能万全。"

谭问："如等到九月皇帝不出去巡幸，那又怎么办？"

袁说："阅兵大典什么都预备妥当了，估计要花费数十万两银子。到时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慈禧）一道出巡，我担保绝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

谭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你掌握，这全在于你；如要贪图富贵，告密封侯，害了天子，这也全在于你。你自己决定吧!"

袁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好像信了袁的话，起来向袁深深一揖，赞袁为奇男子。袁又说："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万一漏泄于外人，人家都要说我们有密谋。因为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袁又问谭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说："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慈禧对皇上意见更深。"

袁说："何不请皇上对慈圣详细讲述必须变法的理由，从此事事请示她老人家？也不妨先恢复六卿官职，以消除意见。而且，变法必须照顾到舆情，不可操之过急，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何必如此急不可耐，激生他变？"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袁觉得谭之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而且已是夜深，便托辞说要赶办奏折，请谭离去。谭走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病，也顾不上递折请训的事了。袁细想如任谭辈乱搞一气，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皇上前稍露词意，或可补救。

于是在初五日请训那天，袁便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都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过急，则生流弊。而且变法最重要的是用人得当，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仰答圣意。新进诸臣中固然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如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所以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皇上闻奏动容，没有回话。袁于是请安后退下，当即去车站回天津。候远和佑文观察（观察

是清代官职名称）同行。抵津，日已落，袁当即到总督衙门谒荣禄，稍微讲了点内情，说皇上圣孝，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大罪其实在下面，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话还没说完，叶祖邽就来了。未几，佑文也来了。袁一直等到夜里二鼓时分，都没有密谈机会，只好先告退，回去吃晚餐（夜里二鼓才吃晚餐，当时的官也不是那么好当），与荣禄约定次早再去拜访详谈。

次日早上荣禄来访（既然袁讲了如此重要情报，荣何以不闭门谢客，专留袁一人密谈，而要惦记一夜，次早才上门去追问？奇怪），袁于是汇报了详细情形。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没有今天你谈的详细。"

袁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皇上，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回到督署后，约见佑文仔细商量。当晚荣禄写信把袁招去，杨华伯也在座。荣禄把慈禧宣布"训政"的电报拿出来给袁看，袁才知道慈禧已经先下手了。荣禄抚了一下茶杯，笑着对袁说："此非毒药，你可饮之。"但袁耿耿于心，生怕他的告密连累了皇上。

荣禄随即奉召入京，临行与袁相约，誓死保全皇上。袁说："虽然赵盾并未弑君，《春秋》仍然说'赵盾弑其君'，这是因为赵盾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的情况也这样，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万一皇上出了事，后世的天下人会怎么说中堂？我本人也世受国恩，倘若皇上不能保全，那我唯有以死报之。"

荣禄说："此事有我与庆亲王斡旋，决不至累及皇上，你不要担心。慈圣是祖母，皇上是父亲。做子孙的处于祖母父亲之间，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于伦常之变则不是子孙所忍言，也不是子孙所敢闻的。"

这就是袁世凯一方的说辞。请诸位将之与梁启超的说辞比较一下，自行判断孰更可信。

## 三、 双方证词辨析

戊戌政变在史学考证中之所以是个难得案例，乃是两造都留下了证词。使用逻辑和常识查考校对双方证词，不难判定谁说的更可信，从而推出事件真相。这一招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演示过了。

为醒目计，将上述两造证言一致和出入之处小结于下。

### １） 密诏之谜

两造都提到皇帝给杨锐下了个朱谕，但朱谕内容不同。康梁提供的版本是：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

而袁记得的大意是：

“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不难看出意思完全不一样。康梁说的是，皇帝告诉他们五人，自己大位行将不保，要他们赶快想法相救。既然是皇帝向臣子呼救，则康梁当然可以将之称为“衣带诏”，杀荣禄自然也就符合孔子规定的君臣大义了。而袁的记述则是说，激进改革会引起慈禧不悦，行不通，所以只有请杨等四人另想好办法。

这两份诏书孰假孰真，光从证词本身提供的线索不足以判断。据康有为自己说，密诏已经被他烧毁，更是死无对证。可惜他没料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虽然在菜市口被砍了脑壳，却不是族诛。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出京，将密诏缝在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1909 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杨庆昶将密诏交呈都察院。御史赵炳麟上奏请公布密诏并编入实录。1910 年，陈宝琛又上奏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屈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以上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1 月版）。

杨庆昶上交的密诏原文是：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

这是说，太后和皇帝对改革步骤的意见不一致。光绪想罢黜“老谬昏庸之大臣”，启用“通达英勇”的新近，但太后不同意，认为会失去人心。光绪自己当然想把那些老臣罢免了，但他的权力不够，真要这么干，连他自己的大位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改革？所以他只好要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和其他同志一道，尽快妥当商量出个两全其美之策来，既能将旧法全部改革了，又能将老谬昏庸大臣尽行罢黜，而且还能让太后接受。

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上谕遣词用语虽然与康有为所称“衣带诏”颇有相似处，主旨却截然不同。如果它是真的，则康梁就撒了谎：首先，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光绪向他们绝望呼救的 “衣带诏”，而是让他们想出个万全之策来，既不得罪太后，又能厉行变法，还把那些绊脚石统

统搬了。如果真是什么“衣带诏”，岂有要他们想好办法后再“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之理？天下哪有请外人代递的政变密谋？更别说那密谋还只是建议，必须“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了。其次，那密诏乃是写给杨锐的，而康有为却无耻冒领了，谎称那是写给他本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转述的密诏大意虽然故意略去了“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改为温和得多的“诸老臣均不顺手”（这改动也完全可以理解，原话一旦泄露，必然伤害老臣之心，成了挑拨君臣关系。此乃袁“公忠体国，为圣上讳”的一片苦心），但更接近于杨庆昶上交的密诏。

袁杨两人所述密诏主旨基本相同，仅此即足证老袁说的是真话，而杨庆昶上交的也是真家伙。既然老袁说的是真话，那么康梁当然是无耻撒谎欺骗天下人，其目的一目了然：为他们煽动袁世凯发动政变寻找借口，使得它变成“奉旨讨贼”的光明正大之举，更为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吹成了皇帝赖以救命的股肱大臣，却全然不顾这么胡吹一气只会把光绪坑得更惨。

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国内某“历史学家” 房德邻先生还要否定，据他说：

“（杨庆昶上交的）’真诏’说并不是确论”，因为杨庆昶于 1908 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中讲了“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但在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在《呈文》中编造保存经过来释疑，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房先生认为他的编造太过拙劣，有很多漏洞，是不足凭信的。（应振洋：《再温戊戌年》，载《中华读书报》）。

您说这位房先生长的是什么木鱼脑袋？除非是造反，备受传统教育洗脑的士大夫有谁敢伪造先帝爷的亲笔圣旨来欺骗“今上” ，犯下双重的欺君之罪？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既然是伪造，何以和袁多年前写的日记中转述的大意基本一致，莫非是老袁伪造？他这么干有何好处？彼时他正在倒霉——摄政王为了替他哥光绪报仇，强迫他回乡“养病”，在这种时刻他去把旧事挑起来，提醒摄政王他是害得光绪被囚一生的告密者有何好处？就算他神通再广大，想来也没本事说服被他告密害死的杨锐的亲儿子和他一道串通作案吧？

如果不是老袁伪造，那就只可能是杨庆昶抄袭老袁的《戊戌日记》，这有可能么？就算他为他爹昭雪名誉的心再迫切，袁可是害死他爹的杀父之仇阿，他爹能在九泉之下原谅他么？那阵子的人满脑袋装的可全是这类东西，虽然现代历史学家房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何况其中还有“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二圣”虽已驾崩，“老臣”们还活着呢，他就不怕人家恼羞成怒，要去捏造出个假圣旨来为自己找不自在？更不用说那是群臣都很熟悉的光绪御笔，杨岂敢伪造？

而且，听房先生那意思，好像那“假诏”是现代才伪造出来似的，这才不会被精通书法和考据学、熟悉先帝的口气以及手迹乃至御用的纸笺的都察院的老先生们——乃至国学大家陈宝琛——一眼看破！房先生既敢公开说那不是真诏，怎么就不会想到这些是人都会想到的问题？您说这文科学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天生跟逻辑思维绝缘？

房先生质疑的依据最搞笑，据他说，自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书都必须缴回，所以杨家不该有密诏。他居然就没想到杨锐接诏不久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光绪被软禁，杨锐自己锒铛入

狱，在此情况下他怎么还敢提那只有寥寥数人知道的密诏？当然，他儿子为了日后洗雪他爹的谋反罪（这其实是康梁等人诬陷的，后文还要论述），冒死藏下了密诏，等到“两宫”驾崩，老袁被黜，这才敢交出来。但私藏密诏和伪造密诏可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杀头有余，前者则是为了保留先帝遗墨以为父亲伸冤，而且最后也缴回给都察院了，说起来也并未违反规定。

２） 天津阅兵之谜

两造都提到拟在九月份举行的天津阅兵，但说法完全不同，康梁的说法是，那是荣禄策划的政变阴谋，准备借皇帝去阅兵之机废黜甚至杀害皇帝，而老袁的说法则是那是他用来搪塞老谭的。老谭逼他在初五请训时以死威胁皇帝，换来一道朱谕，再持此赶回天津发动兵变，杀害顶头上司荣禄，攻占铁路和电报局，部队再星夜赶回北京，一半守卫皇宫，一半包围颐和园，再由谭负责把慈禧杀掉。如此惊天动地的政变阴谋，谭却逼他当时就要表态同意，甚至以和他同归于尽来威逼。他被逼无奈，又不知道老谭是否传达皇帝的真实意图，只好推搪说他需要时间准备，而且皇帝可能反倒会因为他在外作乱而被害。不如趁皇帝到天津阅兵时再举事，那时皇帝近在咫尺，他很容易保护，而且皇帝发话号令全军，谁敢不服？这计划说服了老谭，老袁这才总算摆脱了那匪夷所思的疯子。

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判断何方说的才是真话。我已经在前文指出，康梁之说乃是智力含量为负值的谎言：第一，这是标准的犯上作乱，荣禄若无慈禧同意绝对不敢发动。但慈禧绝对不可能批准这种大逆不道的谋逆，更不会蠢到演成儒家所谓“伦常惨变”，让天下人群起指责她为贪恋权位不惜残害养子。即使在后来得知谭嗣同“围园杀后”密谋后，她也始终未对光绪下毒手，可见她完全明白“虎再毒也不能吃儿，否则身败名裂”的传统伦常的威力。第二，要发动政变，慈禧根本就没有必要离开最容易下手、最可控、最安全的深宫，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地跑到天津去，在诸军云集、最容易引起混乱、误会甚至武装冲突的军事演习场合去发动兵变。皇宫乃是她经营了几十年的最可靠的权力基地，光绪乃是在她淫威下长大的柔弱怯懦的阳痿青年（光绪爷不能人道，以致无后，还如《红楼》上的瑞大叔一样，时时遗精盗汗，最后竟然“痨”死了。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要废黜光绪，她只需发句话就够了。光绪不但毫无抵抗的实力，就连起码的反抗意志都没有。

由此可见，所谓“荣禄欲趁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完全是康梁虚构出来的。既然如此，那老袁说的必是真话，亦即“趁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杀了荣禄保卫皇帝”乃是为维新派接受的暴乱计划。康梁不过是倒打一耙，把这栽到荣禄头上去，籍此把政敌诬为乱臣贼子罢了。

老袁想到以此替代方案去搪塞老谭其实很自然。皇帝九月到天津阅兵乃是他的事业高峰之一，如同《红楼》之贾府在家里接驾似的。他必然一直在全力以赴地筹措，以致在初一“面圣”时还跟皇帝说起此事，说皇上若没有别的事垂询，则他就要忙回去筹措去了。既然在日夜盘算此事，在被老谭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当然就会想起它来，用作缓兵之计。

老谭接受这替代建议也是必然的。的确，如果谭疯子还有三分神志，就会意识到那是让光绪逃出牢笼，让他们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唯一可行之策。他煽动袁武力介入政争，无非是想摆脱慈禧对改革的压制。但正如老袁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已经有了电报的时代，若以外

军奔袭京城，则鞭长不及马腹，弄不好皇帝先掉脑袋，他们手上唯一的王牌也就丧失了，更不用说双方实力对比根本不成比例。因此，唯一的可行之策还是先让皇帝跑到袁营去，再借皇帝的绝对权威杀了荣禄，把他手下的全部军队夺过来。这不但是保护皇帝的最佳决策，而且是充分利用皇帝权威击败政敌，取得权力斗争完胜的唯一机会。

那么，这计划会不会是老谭自己想出来，老袁把它窃为己有了？不可能，因为那并非什么光彩勾当，老袁犯不上去掠人之丑，陷自身于嫌疑之地。而且，老谭性格急躁，乃是个“只争朝夕”、急功近利的愤青，没那耐心等那么久。据老袁说，谭开头反对的理由就是怕还没熬到阅兵皇帝就给废黜了（其实他也没猜错，果然如此），这话极度可信。如果老谭不是万分焦急，也就不至于竟然深夜去煽动素昧平生的将领举兵作乱了。他怎么还会有那心思，想出这种缓不济急的办法来？再说他乃文官，对阅兵之事绝不会如老袁那样日夜操心，不大可能想到那上头去。

３） 围园杀后之谜

这是老袁对老谭最严重的指控，而康梁对此不置一词，讳莫如深。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近年国内研究已经彻底揭开了谜底。著名近现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介绍：

“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设计了武力夺权的计划。一群书生夺权要靠军队，他们找到了正在天津训练的袁世凯，让他夺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围住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 100 名敢死队员，杀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史学界不相信这个说法，1985 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到了毕永年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

从考证的角度来看，杨教授找到的乃是过硬证据，反对者至此应该无话可说了。其实如果史学界不是那么弱智，稍知逻辑推理的话，用不着等到刨出这过硬证据来，光看袁、梁两造的证词就可以推出老袁并未说谎。老谭 游说煽动老袁以武力介入政争，究竟是要老袁解决什么难题？当然只会是去除他们心目中的改革的最大障碍慈禧。光杀荣禄非但无助于强行推动改革，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谁都知道荣禄被慈禧倚为干城，改革派擅杀方面大员，必然要引起老佛爷震怒。她一翻脸，则改革派立即死无葬身之地。维新派当然是傻子与疯子集群，但再傻再疯也不至于不懂“擒贼先擒王”。

因此，维新派给老袁派定的任务，必然是“围园杀后”。杀荣禄不过是为了夺其军，解除慈禧的反击武力而已。当然，他们也充分照顾到老袁的心理障碍，请老袁只负责围园，杀后则由老谭那疯子率死士们进行。这伙人未免太小看了老袁，以为以此掩耳盗铃的廉价花招，即能解除老袁的顾虑！

４） 老袁隐瞒未说的事

从两造的证词中甚至还可以推出老袁隐瞒未说的事来。

第一件就是，老袁曾给老谭献计把慈禧也弄去阅兵，让乱党趁乱杀却。

其实老谭后来被老袁提出的“不如趁阅兵起事”的替代计划彻底说服了，那的确比他和老康制定的疯子小儿科计划高明到不可胜计——那伙烂仔日夜苦思，竟然笨到看不见“外兵一动，光绪在内先掉脑袋，暴乱者立刻输光当尽”那明摆着的结局，还需要老袁在片刻之间便为他们指出来！

但老袁提的替代方案有个缺陷，那就是彼时慈禧已然“归政”给光绪，“退休”在颐和园“养老”，按理不会再与“亲政”的皇帝共同出席阅兵大典，因此，趁阅兵发动兵变，虽然能把皇帝从牢笼里解放出来，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无法除去太后。若太后在北京下诏声讨武力劫持皇帝的叛军，号召诸侯“勤王”，则叛军立即土崩瓦解。谭疯子必然也想到了这点，当时就一定会向老袁指出，而老袁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他宽慰谭疯子的话写下来了：

“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

从袁回答的第二句话中可以看出，老谭问话中略去的主语其实是“太后”而非“皇上”，他问的其实是“如太后九月不出巡，将奈之何？”老袁这才会回答：“我可请荣禄力求太后，她一定会出巡的。”

既然袁答应的只是保护皇帝，在得到皇帝指示后再杀荣禄，那太后出巡与否何以如此重要？谭疯子何来此问？可见此前老谭必曾指出此策无法除去“老朽”，而袁答可在阅兵时除去，老谭才会接着问若太后不出巡该怎么办，老袁又进一步主动承担了说动太后参加阅兵的重任，老谭才最终接受了他的替代方案。

虽然这不过是老袁的缓兵之计，但这毕竟犯了大不敬罪，与答应奉旨杀荣禄本质完全不同，所以老袁不敢把这段对话写进日记，却不慎露出马脚，让百年后的芦某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

大头隐瞒的第二件事，乃是对老谭第二次激将的反应。

根据老梁的揭发材料，老谭对袁两次使用了激将法，而袁不愧是做戏天才，两次都立即顺竿爬，还装出怒不可遏、慷慨壮烈的样子来。大头自己承认，就是这做戏哄信了谭疯子与呆子：“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

第一次激将双方都有报道，大同小异。老袁记录的是：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老梁则揭发：

“（谭）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第二次激将只有老梁的揭发材料，老袁则只字未提：

“（谭）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以常理度之，老梁的揭发不像是向壁虚构。老谭担心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怕大头去告密；第二怕他不敢或不忍杀荣禄，于是便用反话激他。第一次老袁的答话“政治上正确”，当然可以写在日记里。但要让大头杀他的顶头上司，老谭必定要试探其对荣禄的感情和勇气，这是保证兵变成功的前提，在势不能不查个明白。由此看来，老袁因为对顶头上司出言不逊，所以蓄意隐瞒了这段对话，尽管他的回话不过是演戏的台词而已。

大头的表演实在是太出色了。我深信谭疯子离开法华寺之时，一定被这“奇男子”彻底征服了：刀锯加身、危言撼魄之际仍临危不乱，正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谋事深沉睿智周密，与他那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愤青同志相比判若云泥；更难得的是慷慨豪迈，一如他在《战国策》、《史记》上看熟了并信以为真的豪杰之士。以他极有限的阅历见识，大概还从未见过这种智勇双全、豪气干云的英雄好汉。我深信他那“奇男子”的称赞是由衷的（疯子本来也就不懂做戏），那深深一揖更是发自心底、不表不快的由衷折服。

可怜他临走都没想到自己露了马脚：大头说他俩一是近臣，一是带兵武将，来往最招嫌疑，要他回去后赶快装病，不要再进宫去，也不要再来。他竟然“甚以为然”，大概还叹服大头思虑之周密（可见疯子连官场ＡＢＣ都不懂，就这点水平还要当改革尖兵），更没想到这一来就暴露了原来所说的“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等等，全ＴＭＤ鬼话，让大头“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双方智力对比如此悬殊，哪还有弱智威吓、教唆、煽动、领导强智的丝毫希望？

５） 世凯告密之谜

教科书的“经典说法”完全沿袭了康梁一面之词，指控袁世凯告密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剥夺了光绪的名义上的君权，实行“训政”，并捕杀了“戊戌六君子”等维新党人。

近来国内研究已经修正了这一“经典说法”，杨天石教授说：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感到变法要危及其权力才决定动手的。杨从荫的奏章主要有三点：说维新变法是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把日本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些都促使了西太后决心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梁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

这其实明明白白地写在两造的证词中，我实在不明白史学家们过去何以就是看不见。

据老梁的《戊戌六君子传?谭嗣同传》：

“（谭）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

据此，则袁谭夜会乃是戊戌年八月初三晚上的事，会见结束已经是八月初四凌晨了。初五皇帝召见老袁，初六慈禧就发动了政变。

这时间表和老袁在《戊戌日记》中给出的完全一致。只不过他交代了皇帝初五那天召见他时他的应对，并说他在会见一结束后就赶回了天津，当晚就去拜访荣禄，刚说了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一直等到夜里两鼓都没机会再说，只好告辞回府。次早（亦即初六）荣禄来访，他当即向荣禄和盘托出，但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就回去了，当晚又把他叫去，向他出示慈禧 “训政”的通电。接着荣禄就奉慈禧之召进北京去了。

由此不难看出，慈禧发动政变与老袁告密无关。老袁并无直接向慈禧告密的途径。就算有，按官场规矩，他也不会越过顶头上司荣禄一步登天，何况荣禄还是人家派给他的暗杀对象，在理在法他都只能向荣禄报告。但初四那天他无法离京，又不能用电报汇报此类机密，只能等到初五皇帝召见结束后再赶回天津。那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到天津已是傍晚。就算他当晚就向荣禄告密，后者也没有可能立即向慈禧汇报，只能于次日也就是初六派密使赶回北京再到颐和园，还必须先通过太监或女官与慈禧联络。因此，慈禧得知此事再快也只能是初六以后，绝无可能初六一早即起驾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下了光绪的枪，并给各省大员发电报，宣布恢复“训政”。

更何况如果老袁告密在先，慈禧发难在后，那她在夺回名义君权的同时就会下令抓捕乱党。但据老梁的报道， “初七八九三日，（谭）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甚至还去日本领事馆探望在那儿避居的梁启超，一直到初十才被逮捕，说明慈禧听到密报多半是在荣禄返京后，不大可能是初九前的事。

这里无法确定的，是老袁向荣禄告密的决心究竟是何时下的，他的《戊戌日记》恰在此处留下了疑点。如果他一开头就决心向荣禄和盘托出，那就不会有密报被来客打断的怪事发生。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人的总结能力很强，寥寥数语就相当准确地总结了老谭出示的皇帝朱谕抄件的主旨。因此，若他有意向荣禄密报一切，即使开头不说“请大帅屏退左右，卑职有重大机密禀告”，也只会上来就用几句话把大致情况讲清。而荣禄只需听上一两句就立知此事非同小可，只怕立刻就要扬手止住他，屏退左右，并下令闭门谢客，然后再入密室仔细听取汇报。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据老袁说，他刚汇报了一点情况就被来客打断了，等到夜深都没有机会，只好告辞，跟荣禄说定次早再来拜访。但次日一早荣禄便主动登门，他这才有机会和盘托出。如果他这儿说的话是真的，那就非常奇怪。荣禄和他官阶相差甚远，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穆罕默德走向大山，没有大山走向穆罕默德的。如今荣禄主动登门，必是因袁头晚说的话提示他要说的事非比寻常，荣禄在他走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才会次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上门问个明白。

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老袁在头晚造访荣禄时尚未打定主意，所以没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却又忍不住泄露了足以让老荣过后疑惑不定的线索。这非常不符合老袁的性格和智力。正因为他深知此事关系实在重大，他才会以“零一态”处理之，要么守口如瓶至死不讲，要么一讲就竹筒倒豆子，不大可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以致让对方上门来追究，失去了主动立功

的机会。

这就是老袁《戊戌日记》在我眼中的最大的疑点，本人愚钝，无法从既有线索中推知真相。只是恍惚记得国内曾有人考证出老袁其实一直是在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回到天津后并没有立即告密，是在荣禄传达了慈禧训政通电后，他才知大势已去，赶快反戈一击，立功自赎。可惜我刚才去网上查却再也找不到原文了。

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以袁的阅历和智力，不难立即看出维新党人划的是绝无可能登岸的漏船，他再昏聩也不至于去为那些背时鬼莫名其妙地殉葬。而且，如果他真是绝望之余才反戈一击，则后来慈禧和荣禄也就不会那么宠信他了。因此，看来老袁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更大，只是无法确定他下定决心的时间而已。我在下文中试图“复盘”，拼出老袁的心路历程来，不过那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并非什么证明了的事实。

## 四、 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角色的客观评价

上文通过比较辨析戊戌政变涉入者双方证词，结合国内最新研究发现，指出袁世凯提供的证词基本可信，而官方史学（甚至包括剑桥中国近代史）赖以评价袁世凯的事实基础基本是弥天大谎，这就引出了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作用的再评价问题。

官方史书对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袁世凯备极谴责，说他早期投机改革事业，伪装进步，看到皇帝重用维新党人便有心投靠攀附，但后来看出光绪有职无权，又反过去投靠慈禧，为个人名利出卖了维新党人，招致慈禧发动反动政变，血腥屠杀维新党人，中断了改革事业，乃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云云。

愚以为，这完全是典型的党文化冤狱，几乎每句话都是诬蔑不实之词，乃是国人最精通的阴谋论，亦即丝毫不尊重古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先扣上现代帽子，再牵强附会地去发掘种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动机。

老袁主张维新，那是他的阅历和智力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有意投机。那个时代的所谓先知先觉（如今的先知先觉仍然如此），无非是看到并承认“中国文明不如西洋文明，中国打不过洋人，唯一的出路是向人家学习”这么一个简单而难堪的事实而已。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只要和鬼子打够交道，迟早都要得出这个结论。老袁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朝鲜办外交和练兵，又经历了甲午战争，见识过鬼子的厉害，深知自家的痼疾，当然要变成自发的维新党人。他在小站练兵时首先以西法改革中国军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陆军，开办了第一个西式军事学校，成绩斐然，中外交口称赞，深获荣禄和慈禧等人器重，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实际改革家与实权派。早在康有为主张变法前他就作出这些成绩了，乃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先驱，谈何为了爬上去而赶维新时髦？是维新党人去拉他那名声赫赫的实权派，不是他去巴结圣眷正隆的红人们。客观来说，康梁是改革的宣传者，而他是改革的实干家。两者都是改革事业需要的人，不能因为谁的声音洪亮就把全部功劳归于他，把实干家们贬为“跟风派”。

至于“投靠攀附维新党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他和谭嗣同素昧平生，老谭却找上门去，硬要

他去发动兵变，杀了荣禄，攻占电报局和火车站后奔袭北京，兵围颐和园。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唯一可以探讨的就是老谭是否真如他在日记中描写的那样"气焰凶狠，类似疯狂"，不但以死威逼他马上同意他的荒谬提议，甚至要求他以死威胁皇帝下发动兵变的朱谕。这些乖张举动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令人不免怀疑老袁是否无中生有，或起码是夸大其词。但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实话。谭嗣同乃是个镇日生活在古书中的典型的唐吉诃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游民文化的牺牲品。

老袁笔下的谭嗣同的那些乖张离奇行事，虽然太过匪夷所思，却是直接从《战国策》或《史记》上抄下来的，当初鲁国的曹沫就曾用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后者同意退还齐国从鲁国夺取的土地；蔺相如也曾用性命保全了赵国的和氏璧；朱亥椎杀魏国大将晋鄙，使得信陵君得以窃符救赵，而出了这个主意的侯嬴则慷慨自杀，以死相谢被枉杀的晋鄙……这些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难道不是谭嗣同的人生演出脚本？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可以乱真了。

很难设想老袁能凭空捏造出这种生动的古侠士作派来。更别说老梁在《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年甫弱冠就"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长达十年。他在变法开始后鼓吹流血，甚至在被捕前三日还在"与侠士谋救皇上"，完全是个脱离现实、生活在英雄幻想中的唐吉诃德。这种奇特心态的养成，大概与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被虐待的经历养成了崇尚暴力的复仇心理，再加上《史记》《刺客列传》、《侠客列传》一类古代游民文化的熏陶，便使得他变成了 "冲决网罗"（这是他的所谓"仁学"的主张）的士林异类。这在他大概很自然，只是他认定素不相识的袁世凯也是这种"奇男子"就太过于想入非非了些。

即使老袁的描述不足信，业已确定的事实也就足够震得老袁的五脏六腑统统倒转了。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功利考虑上，老袁都绝对无法接受谭的激烈主张。

须知那个时代的人被儒教忠君教义彻底洗脑，视"犯上作乱"为不可思议的滔天大罪，老谭却要他去杀了长官荣禄，甚至发兵杀害"圣母皇太后"！就算是皇帝亲自下了朱谕，又有哪个忠臣孝子会接受这种注定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乱命？就算老谭是他老子，他也只能本着"忠孝不能两全"的君臣大义毅然拒绝。

更糟糕的是，他本来好好地做他的官，踏踏实实地干他的事业，老谭却从天外突兀飞来，毫无来由地将他这局外人强行推入帝后之争，要他在为儒家深恶痛绝的母子相残的"纲常惨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使得他莫名其妙地陷入道德困境，无论帮哪边都绝对只会落个不是：帮太后则是"累太后以不慈"，帮皇帝则成了"累天子以不孝"。对此老袁已经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讲得明明白白了：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

现代读者要体会他这种两难困境，只需假想一下自己去介入别家的夫妻争吵就够了。谭走后，

老袁自称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绝非夸张之词。哪怕他再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英雄，被骤然抛入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也必然要如痴如病，不知计将安出。他后来引用《春秋》对“赵盾弑君”的谴责，反复对荣禄说决不可杀了皇帝，否则他们就要成千古罪人，我看的确是他由衷的心声，也是当时深受儒教熏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心声。荣禄所说“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就足证这是臣子能遇到的最大道德困境。而这几乎无从摆脱的道德困境乃是维新党人强加给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去揽来的。

因此，用当时的道德标准也就是儒教规定的一系列大义来衡量，老袁拒绝与“陷君于不义”的乱臣贼子合作，并举报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是典型的忠臣孝子的模范行为，殊不便以现代自由观或外来的阶级斗争理论评判之。

以功利考虑而言，无论是从君国利益还是从个人利害得失来看，老袁都非得倒向后党不可，这理由他也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解释过了：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

这是说，当时有三大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如果康党奸谋得逞，杀了太后，则一定会天下大乱，内忧外患同时发作，中国马上就会被列强瓜分；第二个危险是如果他当时不与谭某虚以委蛇，欺骗麻痹之，则立刻会被康党杀害，再以他人取代袁的角色，内外夹攻，皇太后就要遭到杀害；第三个危险是在事泄之后，如果荣禄不马上进京调解帝后冲突，皇帝被太后杀了，各国必然以此为借口武装干涉，乱党也会籍此闹事，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幸亏祖宗保佑避免了这三大灾难，但当时危机真是间不容发，堪称危险了。

这三大危险我认为只有第一个存在。如果康谭得手，杀了皇太后，去除了稳定当时危局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弊病，如同我党是今日中国的稳定保障一般），让那伙愤青挟九重天子之威，强制推行他们的激进改革，将“老谬昏庸大臣”悉数罢免，拟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建设新京，断发变服改元（这些都是维新党人拟定的上谕，只是光绪不敢颁发而已。但若弑后密谋成功，皇帝便从此断了退路，只能受康谭任意挟制，必定会颁发），必然引起守旧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对。到时“弑后”之罪便必定成了诸侯“清君侧”的旗号，全国必将陷入大乱，极有可能引起列强武力干涉，如后来之拳乱然。即使免于被瓜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统一局面一旦被打破，乱局就难以结束了，只怕要像后来的辛亥革命一样，制造出个历半世纪才能结束的乱世来，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袁世凯主导下的新政带来的繁荣了，今日中国比现在还要落后得多。

但这危险出现的前提是老袁死心塌地投靠乱党。离了老袁的枪杆子，则毫无实力的康谭辈根本没有作乱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袁毅然倒向后党似乎可以说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即使是用现代标准来看我觉得也是如此。

老袁当然只会在日记中写大道理，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时的烦恼绝对不光是君国利益，

更是被老谭扔进去的个人生死祸福陷阱。他给没来由地夹在皇帝和太后这两扇阴阳磨里，随便哪边都惹不起。虽然太后权倾朝野，可皇帝春秋正富，享有年龄优势。站在太后这边当然可保眼下平安无事，但日后太后死了皇帝必然复辟，到时岂不是要化为肉酱？因此，他虽然最后作出了选择，但那毕竟是非常困难的选择，其实有大半是老谭的表现促成的。

以老袁目光之锐利，不难从老谭荒诞不经的战略谋划、乖张离奇的话语行事中一眼看破康、谭辈实在是一群误国乱国的小丑，竖子不足与谋。老谭跟他说什么："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此话为后人称道不止，反复传诵，他却立刻看出了"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绝非可以合作之辈，就算双方势均力敌，跟着他们干也绝对只有失败的份儿。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看出了老谭此来决不肯空手而归，腰间似有凶器，这绝非夸张之词。老谭既敢在半夜去策反一个素不相识的将领，将暗杀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当然也就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老袁如传统忠臣方孝孺那样当场明确拒绝，只怕立刻就要被谭大侠灭了口。处此危急时刻，老袁的应对可圈可点，当得上智勇双全。

他先断然拒绝了老谭的死亡威胁，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接着又指出了老谭暴动计划的致命弱点——军队远在天津，起事很可能反而断送皇帝性命，然后又推出了他那现实得多的替代方案，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他对皇帝的赤胆忠心，终于折服了老谭，令其乖乖从命而去。有趣的是，这故事本身倒很像《战国策》、《史记》上那些贤相感化折服前来暗杀他们的刺客的故事。老谭那梦游病患者立意模仿古侠士，最后演出的闹剧的角色却完全反串了。

在这其中，他逐步摸清了老谭的底细，连密诏抄件都看了，初步断定老谭并不代表皇帝意图，多半是虚张声势。但老谭毕竟是正当红的天子近臣，密诏上的话是真是假还有待查清。于是他便在初五请训时对皇帝说，改革要慢慢来，不要招急，要使用老成谋国之士，同时跪在地下偷窥"天颜"，发现"上为动容，无答谕"——变了脸什么话都不说。这似乎说明皇帝本人确实倾向于激进改革并"尽去老谬昏庸之臣"的，那朱谕抄件并非老谭伪造。

我想，此时才是袁大头"如痴如病"的高潮时期，回天津的路上他大概一路都神不守舍。直到见了荣禄，他大概都还没最后下定举报决心，之所以对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大概是因为荣禄一直在刺探朝廷情报，早就得知帝后失和，因老袁刚从北京来，不免要向他打听这方面的消息。老袁因为还未下定决心，再加上几天来"反复筹思，如痴如病"，状态不佳，便随口说了两句：这都是下面的小人结党营私，挑拨离间，意图谋害宗社，臣子必须保全皇帝以安天下，云云。因为是泛泛而论，所以没有引起荣禄的特别注意，过后荣禄才回过味来，从"谋危宗社""保全皇帝"的话里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次日一早不待袁来拜便主动上门追问端的。他的到来才促成了袁最后下定决心，当即就孤注一掷，义无反顾地站到"慈圣"那边去了。他此时最怕的就是太后杀了皇帝，让他变成弑君凶手而遗臭万年，但他当然也不会希望皇帝在太后死后复辟，所以他盼望的最理想的解决，可能还是太后废黜皇帝，另立新君。

这些心理活动当然是我根据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拟想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过硬证据，但我觉得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猜测，起码要比官方史学那些不顾时代、不顾起码事实强加于人的阴

谋理论实事求是得多。

不管老袁实际上怎么想，我觉得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私人前途来看，他都做了正确的决策。如哪位不同意我这“满遗”、奴才加汉奸的理论，请您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有陌生人突然来请你参加某种为当时道义绝对禁止而又明摆着只会失败的轻率冒险，您若断然拒绝就会遭到对方杀害，您会怎么应对？

戊戌日记

袁世凯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十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诸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

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顺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历，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揖，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敌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诘以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

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顾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远佑文观察同行。

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邽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

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华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今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唯有以死报之。”荣相曰：“此事有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

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

袁世凯告密之谜再探

芦笛

感谢凌华网友贴出了戴逸先生的学术论文，此文我在写作《袁世凯》系列之前曾在网上找过，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凌先生贴出后，我将文中成句输入古钧，调出了原文，附在本文之后（凌先生转贴的乃是被人简化了的通俗版）。

戴文的主要结论是三点：

第一， 袁参加了康有为策划的兵变密谋，但反对康提议的奔袭颐和园“围园杀后”，建议改为阅兵时请皇帝驰入袁营（至于此后再干什么，是只杀荣禄，还是杀荣禄后挥师奔袭颐和园，戴先生没有说明）。

第二，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

第三， 袁告密乃是被动行为，是在得知慈禧发动政变之后担忧密谋暴露，才赶快反戈一击，主动汇报了守旧派并不知道的围园杀后的密谋，因荣禄的力保而免罪。

第二点现在似乎已经是国内史学界共识，不必再讨论。但其余两点我觉得都不能成立。

关于第一点，作者的论据是：

１） 袁本人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康有为关系很好，还曾通过关系试图替康有为打通关节，使康的上书能为皇帝看到。

这一点倒无可怀疑，但袁参加发起强学会时已经做官，而康当时不过是个布衣，不存在袁去巴结康的问题。作者也承认，“此后，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去天津练兵，没有什么交往。康有为再到北京，进行百日维新，袁世凯已是掌握兵权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与朝士们往来，故而也没有多联系”。

２） 袁被越级提拔为候补侍郎乃是康竭力举荐的结果。袁为此感激涕零，曾写信给康有为表示感谢。据徐永年的证词，康有为曾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 仆曰’袁可用矣’。”（毕永年：《诡谋直纪》）。据作者解释，这就是袁“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

这虽是毕永年的证词，但原始证据乃是康向他出示的袁的去信。窃以为，康有为是伪造文书的老手，他出示的信函是否靠得住，只有天知道。据毕永年说，康试图拉他下水参与暴乱，但他认为不可行。不能排除康为了诱骗他入伙而编造袁的信函，以增强他的必胜信念。

袁对被越级提拔是否真的感激涕零还是个疑问。当时新旧两派势成水火，在此敏感时期突然被皇帝越级提拔，肯定要招来失势的守旧派的忌恨。袁精明过人，和新旧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不至于看不出这点来。他在日记中说“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连“汗流浃背”都用上了，可见他完全看出了隐藏的风险。他还特地列举了“郭友琴等友”、“刚相国、王、裕两尚书”等人作为他试图力辞的证人。言之凿凿，涉及多人，不大可能是事后串通编造。实际上，他去找刚毅（守旧派首领之一）等人，很可能是去洗刷表白自己虽然蒙受维新党人举荐，但那并非他的本意，他并不想做那个官。

作者还引陈夔龙的话来证明袁急于向上爬：“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但作者自己也承认陈与袁素来不睦，这完全可能是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背后中伤诋毁，缺乏取证的可靠性。

即使是袁真的给康写了那封感谢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只是司空见惯的客套，一般都是在私事的意义上使用。将其断为“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甚至飞跃到认定精明过人的袁世凯看不出维新派面临的险恶局势来，主动承诺介入密谋，未免过于轻率。

３） 作者虽然不得不承认：“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但仍认为袁和维新派保持着私下来往，“联系人即是徐世昌”。

这完全是作者的武断猜测，并无实证。除了徐世昌也是强学会发起人，参与过袁在天津接见康的学生徐致录之外，作者对此重大猜测并未出示任何证据。

４）作者说：“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此孤证出自康有为的证词：

“（八月）初三日晨，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语，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于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梁启超、徐仁铸、徐仁录、康广仁），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按：括号内为作者原注）

作者据此认定：“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不容怀疑。”

其实近年研究已经证明不但所谓“衣带诏”是康有为根据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西历９月１５日）下给杨锐的密诏篡改捏造出来的，而且就连众人聚集痛哭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国内学者姜鸣指出：

１）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初三早上谭嗣同应当入宫处理公务，岂能参与聚读密诏？

２）康捏造的假诏在初三还未伪造出来，林旭传达的只能是真诏。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去写奏折提建议。

３）康有为说徐世昌也在场，那他势必得知密诏内容，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必然会立即转告袁世凯，使袁世凯对整个谋反计划一目了然，后来大可在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时指出那完全是矫旨政变，也就可不背“欺君告密”的恶名了。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徐世昌参与聚读密诏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1 月版））。

这些驳斥都非常有力。还可以补充的是，如果徐世昌也卷入密谋，那事泄后就必然会遭到惩

办。据作者说，老袁是靠及时坦白得以立功赎罪的，那老徐又是靠什么脱罪？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老徐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官一度做得比老袁还大吧？难道慈禧就这么面慈心软，放过一个又一个参与策划谋杀她本人的密谋者？

因此，不能不承认所谓徐世昌与闻密谋，完全是康有为的又一弥天大谎，然而作者竟然凭此孤证飞跃到如此断然而严重的结论：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经画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并进一步飞跃得出以下推论：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

如此活跃的想象力，用于写历史小说倒是得其所哉，但用来写学术论文就是搞笑了。奇怪的是，作者怎么就不会问问自己：既然有徐作联络人，谭嗣同还何必找上门去？而且，既然袁与康关系那么好，又作出了“全力支持维新派的承诺”，康为何不自己去找袁商量如此重大的密谋，而要让既与袁素昧平生，又据说是不赞成围园杀后密谋的谭嗣同前去？

既然徐世昌参与跪诵密诏纯属捏造，那么康有为为何要捏造这神话？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他的愚蠢冒险作事后洗刷，以表白他决定拉袁世凯下水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他的愚蠢到不可思议的密谋害死了六君子，而是袁世凯背叛了他们的信任。

据此可知，作者的第一条结论，亦即袁参加了康有为策划的兵变密谋，但反对康提议的奔袭颐和园“围园杀后”，建议改为阅兵时请皇帝驰入袁营云云，碍难成立。

关于第三个结论，亦即袁告密乃是被动行为，是在得知慈禧发动政变之后担忧密谋暴露，才赶快反戈一击，坦白了守旧派并不知道的围园杀后的密谋，因荣禄的力保而免罪，作者的论证如下：

１）袁初三即从谭那儿得知围园杀后的密谋，明知慈禧处于危险中，却不在初四找弈劻、刚毅等慈禧心腹报告，而是在初五返回天津。

这条我已经在《袁》系列中论述过了。谭矫诏给他的密令是诛荣禄后再奔袭北京，他不能不向顶头上司兼他的暗杀对象荣禄汇报。此外，他虽然怀疑谭是矫诏，但初五请训时他曾刺探过皇帝的态度，发现皇帝倾向于康谭的激进改革，所以毕竟吃不准谭说的到底有几分是真话，因为夹在帝后之间而“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岂能贸然去找后党首领和盘托出？

至于所谓“慈禧处于危险中”云云，则是作者看多了武侠小说幻想出来的。连谭大侠本人都

知道，没有袁派兵围住颐和园就杀不了慈禧："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只要袁不派兵围住颐和园，杀了守园的禁军，再放谭率领的好汉入内，就算谭找来的全是轻功非凡、高来高去的大侠，居于深宫被重重保护的慈禧也就绝对没有危险可言，此乃人类常识，老袁岂有不知之理？

２）返回天津后他当晚见到荣禄想汇报，却又被来客阻断，要延宕到次日才跟荣禄汇报。

这一条我也觉得可疑，已经在那系列里讲过了。我的猜测（只能是猜测，这就是我和作者的区别，他但凡作猜测时从不讲明，如同叙述已知事实一般斩钉截铁，前述"密谋的联系人是徐世昌"就是如此，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徐怎么穿梭来往于康袁之间）是，因为事关重大，袁摸不清皇帝的真实意图，夹在帝后之间左右为难，因此迟迟未能下定决心，直到初五晚间仍然如此。这虽然是缺乏直接证据的猜测，但可以确凿地说，袁《戊戌日记》的这一疑点，可以解释为他迟迟未下决心，但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得知慈禧政变后才被动告密的，稍知逻辑思维的读者都该明白这一点。

３）作者认为，《戊戌日记》的另一疑点是，"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看来作者真是无法摆脱武侠小说的影响了——哪有什么必要"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难为作者居然看不出来，这事的棘手处，是皇帝据说也卷入了密谋。作者据说是研究历史的，却竟然不知道在传统社会中，儿子谋杀母亲，哪怕是在平民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伦常惨变"，何况那儿子还是他们必须赤诚效忠的皇帝？两人都知道这事如果密报给慈禧，光绪很可能被杀。那时他们就要被谴责为弑君凶手，正如孔子在《春秋》中不谴责真正的弑君凶手赵穿而谴责无辜的赵盾一般。舆论不敢公开谴责太后，但决不会放过这两头替罪羊。这就是两人何以"筹商良久，迄无良策"，他们当然是为光绪担忧，但那说到底还是为自己担忧，因此进退两难，商量不出个办法来。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只是康谭谋反，那就绝对不会如此难办了。老袁说得那么明白："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作者就是不懂，看来要现代学者明白传统社会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４）作者引用两段笔记小说，来证明袁世凯是在荣禄得知慈禧训政的消息后严阵以待，才吓得赶快乖乖坦白的。

第一段笔记小说是：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之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

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⑤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这种荒诞不经的道听途说，作者也竟然当成确凿史料引用。对文中诸多触目错误视而不见，单单把对自己有用的 “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话拎出来，当真是“量体裁衣”！史学考证竟然可以如此进行，令人大开眼界。

如果这段“史料”可靠，那么，袁世凯初五请训时，光绪确实下令让他去发兵围园杀后，而袁拒绝奉诏，“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而光绪似乎也未曾龙颜大怒，就这么算了。退朝后，有某个西太后派来监视光绪的侍卫大臣觉得他应对得体，拍他的背赞道：“好小子！”

这算是什么弱智神话？从光绪给杨锐的真正密诏可以看出，光绪根本就没有发动兵变暗杀太后的计划。就算真有，他何不让谭带着朱谕去秘密找袁，却要光明正大地在袁请训的正式场合中宣讲，故意让太后派来监视他的侍卫大臣听见？

就连作者视为钢鞭材料的“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话也难以成立。作者也承认，慈禧宣布训政时并不知道弑后密谋，上谕要抓的只有康氏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连光绪新近提拔的四章京都没事。袁世凯并未卷入新党（起码是没有公开卷入），不过是被皇帝越级提拔为候补侍郎而已。荣禄凭什么猜疑他造反作乱，以致如临大敌，“令卫兵夹道罗列”？而且，如《戊戌日记》表明的，慈禧宣布训政的上谕是用电报向封疆大吏们通报的。杨崇伊走得再快，想来也快不过电报吧？由此可见其语之无稽。

另一段笔记小说更可笑：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追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这一看就是陈夔龙吹捧他的老上司荣禄，诋毁其竞争对手袁世凯捏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旧小说的滥套：光绪给袁下旨，让他杀了荣禄，夺了他的直隶总督职位，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奉旨后回到天津，见到荣禄，不敢下手，只好把圣旨拿出来给荣禄看，指望荣禄乖乖自动授首，不料荣禄处变不惊，拒绝从命。袁知道无法杀他，只好大哭失声，长跪求饶。

这神话甚至比第一段还要荒诞离奇：光绪下密旨杀荣禄本来就无可能，对此我已经充分论证

过了，就算是可能，也决不会在圣旨上写让袁兵围颐和园，而袁既然存了杀荣禄的心，也就绝对不会把写了这种话的圣旨给荣禄看。这种神话本来连孩子都瞒不过去，然而我们的史学家却当成史料郑而重之地引用了！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明明这两段传奇的主旨完全不同，根本捏合不到一起去，而且连时间或地点都弄错了，然而作者就是有那本事苦心孤诣地"量体裁衣"，无比牵强地把"吻合点"挑出来，用来证明他预设的结论！

因此，窃以为，作者的这两段"论证"完全是搞笑，碍难成立。

其实，已知事实已足以证明袁世凯告密是主动的，乃在他和荣禄得知慈禧实行训政之前。这事实作者其实也引用了：太后训政后，"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如果袁不是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主动告密，而是在事发之后才吓得说出来，那就绝对不会被提拔到负责拱卫京师的护理直隶总督的高位上去。须知谋杀太后乃是谋反大罪，在过去是要灭族的。慈禧只杀密谋者本人，已经是法外施恩了。但她绝不会宽大无边到不惩罚一度参与密谋的罪人，荣禄再受宠信也不敢求这个情。就算是慈禧宽恕了袁，甚至不降他的官，也绝对要解除他的兵权，岂有反而提拔这个首鼠两端、望风使舵的不可靠分子去接管直隶的兵权之理？直隶总督从来是关键职位，慈禧当初防范光绪的重要一着就是调心腹荣禄去任此职，说明她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袁世凯若非深得她的信任，她又岂会在刚刚发动政变后政局不稳之际，派他暂摄荣禄留下的职位？

总而言之，看了戴先生的论文，我原来的结论不变，那就是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的基本是真话。该文发表于荣禄死后可以用其他原因解释，并不能作为它是伪作的证据。

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一）

芦笛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开始。同年 9 月 21 日（西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剥夺了光绪拥有的名义君权，宣布实行"训政"，废除了光绪在维新时期下达的上谕规定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留下京师大学堂（亦即后来之北京大学），历时 103 天的"百日维新"就此结束。要等到 8 年后的 1906 年 9 月 1 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改革才再度在全国规模推开。

改革不但被推迟了 8 年，而且国家还在此期间经历了拳匪暴乱的浩劫，不但国计民生因沉重的赔款遭受了难以恢复的打击，而且朝廷威信扫地。在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方面大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许应、奎俊、袁世凯等人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公开拒绝接受朝廷乱命，置身暴乱之外，直接和外国政府官员接触，承诺"保境安洋"，实行所谓"东南互保"，为后来的军阀割据隐隐开了先河。慈禧太后犯下的这致命错误，使得革命乱党罪恶的排满宣传在新军中获得了极大市场，最终使得朝廷为抵御外侮建立的新军反倒成了颠覆自己的主力。经过

民初的短暂而辉煌的“共和”后，中国终于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等到老蒋靠枪杆子勉强当上名义国家领袖后，国民政府却再没可能像清廷那样，利用孔教赋予皇帝的不可置疑的权威，将改革推向全国。不可收拾的乱局刺激了苏俄和日本的贪欲，两国疯狂的直接和间接侵略最终导致国府垮台，中共上台，从此将中国打入九幽十八狱，至今看不到超生的希望。

回首这段痛史，读者或许都会感到由衷的惋惜:“如果百日维新不被慈禧颠覆就好了!”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放弃了过去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谴责，（好让海外所谓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如张三一言辈］接过这革命口号薪火相传），为维新党人作了平反，以致谭嗣同不但成了 80 年代某部著名电影的题材，而且成了柴玲的效法对象。在这种情形下，上面那惋惜似乎成了国人的共同心声，其间竟然没有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百日维新为何来也太晚，败也太速？”

比较一下中国和近邻日本就能立即看出，这个问题乃是我们绝对无法回避的，它充分暴露了两国国民心理、性格等素质的巨大差别。

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日本。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国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53 年，美国舰队进入日本江户湾，迫使日本幕府于次年与美国签订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

说起来，日本遭受列强欺侮还在中国之后，而且老美比老英文明得多，只是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享受领事裁判权，并不曾抢走日本土地以及要求赔款，但这仍然激起了日本内部的强烈反弹，改革派遵循安内攘外的正确程序，推出天皇来作为新政的旗帜，经过 1868 年的“戊辰战争”击败了幕府军队，开始明治维新，在全国推行西化改革，迅速收到奇效，26 年后（亦即 1894 年）就在甲午战争中全歼老大中国的北洋舰队，击溃中国陆军，获得海战和陆战的完胜。同年，日本通过谈判基本全部废除了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36 年后（亦即 1904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更强大的老大帝国俄罗斯，同样获得海战和陆战的完胜，从此跻身为世界强国，以与列强平等的身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仅仅花了 36 年的时间，日本就从一个幅员狭小，资源缺乏，文化落后的小国变成了世界军事强国，最后竟然构成了对全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文明世界需要最大的两个白人国家和最大的黄人国家联手，才能把那魔鬼打入地狱（典出《十日谈》）。

然而这一切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发生。国人为中国既有的文明辉煌成就陶醉，悉数成了夜郎自大的井蛙河伯，始终无法看到或誓死不承认这些简单事实：

１）相对于博大精深的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全面落后，无论在哪方面都只能算一个未开化的半野蛮国家。

２）因此，若恃实力与列强相抗，则中国不过是人家的下饭菜（或开胃酒，或饭后细点，待考）。

３）在奉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哲学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唯一的希望是如日本那样尽快实现西化，变则兴，不变则亡，毫无选择余地。

可惜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却没有几个国人能看到，少数先知先觉看到了也不敢说出来，林则徐

那个聪明人就是这样。他原来雄心勃勃，以为堂堂天朝上国平定夷鬼作乱易如反掌，和英军接仗后才发现与鬼子打仗完全超出了兵书范围。他在私人通信中坦率承认，连敌军都见不着就莫名其妙地被洋枪洋炮打死，这种仗就算是古之名将转世也没本事打赢。这位“民族英雄”对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就是隐瞒了这一生死攸关的发现，以维持他全国清流领袖的名声，使得全民继续陶醉在“不是咱们不行，而是权奸祸国”的幻觉里，直至今日都没有醒转模样（按：这是蒋廷黻大师的观点，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林则徐运气好，平生就只跟鬼子打过一次交道，接着就忙着去新疆挖坎儿井，然后又到云南当云贵总督，处理回回暴乱，最后奉圣旨星夜赶到前线平定发匪暴乱，却非常及时地完全必要地拉肚子拉死在路上，不但逃脱了曾国藩式“满清走狗”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没有机会去办洋务，当李鸿章式被迫在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和约上签字画押的卖国老贼，就此保住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使得许多愚民至今还以为“如果没有撤换林大帅，咱们肯定打赢了鸦片战争”。

其实林大帅也没有太多可责备的，宋明理学培养出来的清流们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了，当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李鸿章后来卖国竟然到了这地步，他明知打不过鬼子，却又不敢公开主和，只好眼睁睁看着政府宣战，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赶快打输，因为反正是要打败的，打的时间越长，浪费的金钱越多，最后鬼子提出的割地赔款的要求越苛刻。所以他才会在中法战争中在中方取得所谓“镇南关大捷”后当机立断，见好就收，趁机和法国签订和约，割让了越南，免去了赔款。由此可见“政治上正确”的清流辈祸国神通之大，熟悉四人帮“路线斗争”高调的同志都该由此看出他们就是宋明理学的真正传人。

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幻觉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被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化外蕞尔小国打败，而且败得那么惨，和约如此苛刻，自满清立国来还见所未见。它引发的震撼难以言表。不仅民间出现了改革的呼声，而且连坚决主战的光绪都从夜郎迷梦中醒了过来。我恍惚记得（找不到出处了，请网友帮忙，似乎是４０年前从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上看来的）。他之所以毅然决定变法，乃是被康有为（？）奏章上的大声疾呼深深震动了，记得那上面说，中国在西洋鬼子眼中不过是个野蛮国家，“昔之视我为日本者，今则视我为安南（越南）、印度之亡国之邦”，瓜分亡国之祸危在旦夕，云云。

不幸的是，在开始觉醒的过程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终于招来了改革事业的夭折。

每逢社会需要变革时，国人往往暴露出两大触目的劣根性，一曰：“虚骄”；二曰：“浮躁”。前者是保守派的突出特征，而后者则是改革派的专利，以革命家为极致。这两者相辅相成，就构成了颠覆改革事业的主观因素。

凡是改革，一般都要遇到两大障碍，第一是国民思想障碍，它主要表现为国民的虚骄心态。改革意味着思想转型，新旧思想相距越大，则阻力越大。第二是政治障碍。改革乃是不同程度上的社会转型，必然要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社会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转型幅度越大，则抵抗越激烈。

这两个问题在当时中国特别严重。变法乃是中国向西洋式社会全面转型的首次尝试，而两种社会完全是天差地别，无论是在国民思想上还是社会结构上，改革都将带来巨变，其转型幅

度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还见所未见。当然要遇到空前强大的阻力。

这其中以完成国民的思想转型的任务为最艰巨。首先，中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井蛙情结天下无双。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今日网上仍有许多“尔础高老夫子”（典出鲁迅《高老夫子》）式的“当代大儒”在招摇撞骗，鼓吹早已寿终正寝的中国文明如何如何冠绝全球就够了。要让百年前的中国人普遍接受“咱们还不光是科技不如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不如人，不过是一个半开化的前文明国家，必须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从头学起，不能再坐井观天，故步自封”，根本就没有可能。哪怕是今天，说出这种大实话的人如芦某还要变成大汉奸，何况是百年前？

其次，传统中国乃是最保守、最守旧、最僵死、最缺乏生机的社会。孔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有效地冻结了中国达两千年，取消了社会主动改革求新求变的可能。它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政治学，厚古薄今，推崇神话中的远古盛世，认定当今之世乃是“人心不古”造成的堕落；提倡“天不变，道亦不变”，反对改革社会制度；提倡复古，反对求新求变；重义轻利，提倡安贫乐道，清心寡欲，反对追求富裕生活，视“人欲横流”如洪水猛兽；认定道德完善不但是个人的人生目的，而且是君王最重要的施政，反对耽于“奇伎淫巧”，“玩物丧志”，发展科技和生产力；提倡思想管制，反对“惑世诬民”的异端邪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引入西方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社会进步动力的物质主义，其困难可想而知。

更严重的是，经过两千年的统治者的反复洗脑，孔子被捧得越来越高，以致全民成了“凡是派”，任何有违圣贤教导的轻举妄动都要被清流们手挥古代的“小红书”轻易打下去，使得所有的改革者都必须使出“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招来，洋务派之所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毫无缘故的。而康有为为了变法，不惜放肆强奸圣人，写出《孔子改制考》来，把孔子伪造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愣说孔子之前的历史无据可考，儒家《六经》乃是孔子假托古代圣贤伪造出来的，目的是“托古改制”，是借捏造的古圣贤权威来实行社会改革。康这种做法从学术上看当然很卑鄙，但也确实是在当时国情下出于万般无奈必须使用的策略。

此外还有所谓“祖宗成法”。孔教提倡敬老崇古的伦理道德，运用到国家层面，便是所谓“以孝治天下”，使得先前的皇帝留下的“祖宗成法”成了类似美国宪法那样绝对不能违反的东西。凡是祖先没干过的事，“今上”都绝不能干，否则就是逆子孽孙。这套家法桎梏之严密，使得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为了设立个咨询机构架空军机处，都得到祖先留下来的《历朝圣训》中寻找先例作为法理依据，以说服慈禧他这么干乃是谨遵祖训（“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捧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梁启超：《谭嗣同传》）。

对此思想障碍，行政措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宣传教育去克服。必须充分肯定，维新党人在启动国民思想转型上立下了大功。他们四出奔走，大声疾呼，向国人宣传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蒙受的奇耻大辱和惨痛损失，通告大众国家已经到了危在旦夕的生死关头，唯一的出路是变法维新，否则就要面临瓜分亡国的惨祸。这宣传打动了精英们中的先知先觉，使得他们终于睁开眼睛看到了现实，这一成果就连在光绪给杨锐下的密诏中都能看出来：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

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又是“积弱不振”，又是“阽危”，其急切盼望“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之心跃然纸上，可见康梁辈的宣传确实说服了皇帝。这可是启动改革的最关键的一步。共党媚俗邀宠的拜人民教和拜革命教贬低甚至否认皇帝的作用，使得今日中国人全然不知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离开统治者的“恩赐”，社会进步不过是空话一句。

因此，就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克服改革遇到的思想障碍而言，维新党人确实立下了历史功勋，也没有犯下什么重大的策略错误。

但在遇到政治障碍时，康谭等人却充分暴露了“只争朝夕”、“毕其功于一役”的劣根性，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主宰了自己，彻底丧失了清醒认识现实的起码神志（遑论政治智慧），竟然决定以“宫廷暴力革命”的土匪手段去搬掉他们心目中最大的绊脚石慈禧，挟九重天子之威强制推行激进改革，“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使得政局于旦夕之间焕然一新，却全然看不到这么做只会断送改革事业，甚至有可能危及皇帝的性命。

最不能原谅的，乃是他们从事轻举妄动的冒险的决定，竟然是在光绪向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后作出的。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西历 1898 年 9 月 15 日），光绪召见杨锐，下了密诏，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人家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我不是不想按你们说的那样，把老谬昏庸的死硬派统统撤了，换上勇于改革的新血，但我没有这么干的实力，首先在太后那儿就通不过。如果硬要这么干，我就会失掉帝位，一旦我失掉帝位，你们也就失去了改革的唯一指望，还谈什么改革大业？所以，我现在给夹在中间，非常为难，你们最好想个万全之策出来，既能达到政府换班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引起太后震怒，连累我失掉帝位，我现在实在是不胜焦急，翘首盼望你们赶快想出这个良策来。

任何有三分神志的政治家，如果有点起码的责任伦理观念，看了这绝望的呼声，　都只会惊出一身冷汗来，就算想不出那两全齐美之策（那是绝对不可能想出来的），也只会毅然决定暂时退却，以免激化矛盾，促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不但害了信任重用他们的皇帝，更使得改革计划鸡飞蛋打。而这正是老成谋国的袁世凯的反应，据他的《戊戌日记》：

“予（袁）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顾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的确，既然皇帝为难成这样，那何不请他向太后仔细解释为何要变法，以后凡事先请示后办理，以消除误会。而且，变法必须照顾到舆情，不能走得太快，实在不行时减慢或暂停改革都行，何必如此急吼吼的，非要激出大变来才算数？

任何人看了这话，哪怕是现代人也罢，都得承认那是当时唯一可行的策略，然而谭疯子的回答却令人实在不知道他到底吃错了什么药。这话并非老袁事后捏造，确实是谭的政治信念，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就曾豪迈地引用了他的名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所以，在他看来，流血不但是变法的必要条件（“非流血不能变法”），而且是充分条件（“变法从流血而成”），不流血就不能变法，只要流了血，变法也就成功了！无怪老袁要觉得“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的确，人都疯成这样了，你还能跟他有什么沟通余地？可笑的是这疯话竟然为后世中国人代代传诵！